

严家炎先生的治学精神

高远东

【作者简介】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

【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22.1.23~29

严家炎先生是著名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教育家,也是笔者的授业恩师。从2013年至今,曾两次参与严老师的学术思想研讨会议,却都没发言和写文章,一是因为千头万绪,不知从哪里说起;二是因为千言万语,不知说什么才好。关于他的治学精神,现成的概括当然很多,比如一种说法是:北大的五四精神,落实到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民主”就表现为谢冕老师,“科学”则由严家炎老师代表。现在会议落幕,打开崭新的《严家炎全集》翻看,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勇说的一句话:严老师的著作不只属于他个人,而且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全体同人,是我们业内的公共财富和共识。也想到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术代表之一,除了大家都讲的科学、严谨、求真、求实这些较笼统的概括,严老师的治学精神究竟有哪些?较之个性鲜明、魅力十足的王瑶、唐弢、李何林、任访秋等第一代学者,其治学内容和方法究竟有哪些异同?它与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学术关系如何?我想,凡事总须研究,凡研究总得建模,需要建立坐标,在关系中厘定其价值和意义,否则游谈无根,无法中肯。所以本文愿聚焦于三个问题,期望借这三个问题的回答,能对严老师的治学精神和风格有所确定。这三个问题涉及文学研究的普遍价值和原则,也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为:一、文学研究是该偏于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怎样才最好?二、文学史研究该如何取舍美学原则和历史原则?三、对文学研究的学术体制,是以“立”为本还是“破”字当头?应该如何建构并寻求突破?我觉得严老师的治学内容、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就是建立在对这三个问题的个性解答之上。

一、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

这个问题是在2011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严老师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术讨论会上,由黄子平兄提出来的。黄子平是当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也是华文世界里有世界影响的文学教授,他退休后被聘到母校教现当代文学,感受到北大中文系注重文学史的学术传统的无形压力。我听他在多个场合吐槽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太重视文学史而忽视文学批评,他甚至认为,文学史也只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文学批评显然是比文学史更基本、更直接、更内切于文学。我非常理解黄子平的抱怨,在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建制里,文学史确实比文学批评更基本、更直接、更内切于大学人文研究的体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每本文学理论教科书都对二者各自定义、区别,说明这是两个在文学研究体制内不同,在文学研究体制外却常被混同的门类。文学批评重在作家作品的意义进行发现和评价,离文学创作更近;文学史则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重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其社会、文化、历史等关系的考察,试图对文学发展的历史内容做出记录,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行总结。这确实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在课堂上,曾听陈贻焮先生嘲笑一些学者对文学作品不具艺术判断力,分不清作品的好坏,但他们对文学的外部关系、对文学生产和流传历史的研究,却又十分杰出。在文学研究中,确实存在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如何选择的问题。

黄子平吐槽的意义,我以为是针对当今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一些问题的。当今学术建制完整且阵容强大,经由文学史研究规训的新生力量一代代涌现,学位论文套路和教科书思维大有一统文学研

究江湖之势。而且在北大,和全国大部分院校不同,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各自为阵,在体制上就自然形成某种分野。最关键者,是在文学史研究“杀死”文学之外,即使当代文学批评本身,也丧失文学批评的真精神——文学精神和批评精神两者皆失,甚至连起码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诚实判断都难做到。而严家炎老师的工作,对于纠正此两弊,我觉得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严老师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都要,二者不是相异相敌,而是相辅相成、取长补短、分工合作——这是严老师学术气象的构成要件之一。严老师青年时期受刘雪苇等文学启蒙,尝试过土改题材的小说创作,入北大后追随杨晦先生等治文艺理论,留校后却改治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久即以《创业史》评论蜚声文坛,同时以对“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小说的研究入选教育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教材的撰写——所有这些,都说明他是带着文学从业者的全套武艺,即从创作到理论、到批评、到文学史的万千锤炼来施展拳脚的。“十七年”和“文革”两个时期,今天看来无论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研究,都是政治主导,能够留点经得起时间淘汰的成果极为不易,但严老师关于《创业史》的评论、关于“五四”新文化领导权和“五四”小说的论断,自立论起至今屹立不倒,不能不说与其对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坚持以文学为目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兼取、美感经验和理论分析并重的特质有关。以今天饱受赞誉的《创业史》评论为例,当年严老师承受的,其实并非一团和气的肯定,说好点是“三分鼓励,七分批评”吧。开始两篇《〈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①当然是得到邵荃麟和《创业史》作者柳青等赞许的,但另外两篇《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②讨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的论文,就基本作为“反方教材”而存在了:不仅柳青自己反对严老师的观点^③,周边同事——如同为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的张钟老师,也著文商榷。记得翻阅当年那些压顶的论争文章,颇有点心惊肉跳之感。严老师“横站”在《创业史》评论战场“独战群儒”的勇气和气度,由于对小说文本解读贴切,对小说所反映社

会生活认识深刻,对小说人物塑造之得失评判真挚精微、忠于内心感受,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文学远景的理解成熟老练,因此在文学与政治的两难之间,在理想教条和固执现实的拔河之际,具有了坚实的“钢筋铁骨”的支撑,使其“着眼于艺术而又饱含着思想的小说评论”,能够洞穿历史的妖风迷雾,耀然出于光明顶上。我上大学时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是由张钟、洪子诚、赵祖谟、余树森四位老师合著的《当代文学概观》,我看其中对《创业史》的评价,作为“不易之论”,基本照搬了严老师《创业史》系列评论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严老师笔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是可以统一的。二者二而一,一而二;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也是在昭示,文学研究的本质在综合而非分裂,在多样性而非纯粹性。

二、美学原则还是历史原则?

新时期以来,严老师虽然依然关注当代小说的发展,对姚雪垠《李自成》、张贤亮《绿化树》、陈忠实《白鹿原》等作品写过评论,也参与多届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但随着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出任副会长、会长,随着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出版,严老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声望日隆,社会影响逐渐盖过了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声誉。那么,作为文学史家,其特质何在?尤其是,他和王瑶等第一代文学史家的异同何在?与后起的第三代文学史家如钱理群、赵园、吴福辉、陈平原等的异同何在?

我以为,奠定严老师文学史观的价值观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文学观,这是严老师、樊骏他们这个中生代群体的特征。王瑶(以及李何林、任访秋)他们那一代学人,虽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学术根基却建立在民国学术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传统之上。后来钱理群、赵园、吴福辉、王富仁、刘纳他们所做的文学史研究,虽然其文学观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但其学术却始于对这一思想传统的扬弃和发展。只有严老师、樊骏他们,算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捕捉的“俘虏”,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是历史唯物主义吧,成为他们理解人类社会、认识人类生活乃至

理论地“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你固然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那个时代谁不马列呢,不是连冯友兰、朱光潜都改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吗?但若你能看出冯友兰和李泽厚的区别,就一定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起步学术之路的那一代学人的支柱作用和血脉骨肉的生成感和牵制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和历史观之中,乃是其对于人类社会包括物质生活、制度结构乃至精神意识活动的全部内容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形式,其美学原则和历史原则之统一的要求,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精髓,而且直接就是严老师、樊骏这一代学者从事文学研究的行动攻略和方法指南。

严老师自己后来比较多强调他的治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史学品格,特别是对第一手材料的倚重。但我理解,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史”的根据不仅指向文学史史料的客观真实,而且包括研究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诚实的主观感受,这两者必须都是“第一手”的,缺一不可。严老师的文学史研究,正是文学批评与历史研究的统一,美学原则与历史原则的统一。他一直诚实地奉行的,在血液里流淌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和社会历史原则兼顾的文学批评精神。^④

就历史原则而言,严老师早期喜欢引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强调学术判断必须建立在事实材料的充分占有之上,论断必须依据历史事实做出,否则即使观点再新颖深刻,面貌再漂亮吸引人,也只是卖弄皮相,不足取。在新时期伊始的“拨乱反正”时期,严老师正是凭着自己发现的硬材料,根据对文学作品的正直理解,回到历史,回到事实,使长期以来一个个被政治利用、被刻意歪曲甚至被恶意篡改的文学史真相得到恢复和科学揭示,像萧军在东北《文化报》《生活报》因“各色帝国主义”及“反对土改”问题挨批^⑤;丁玲《在医院中》所写陆萍医生与环境的紧张属性如何问题:它是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与革命集体”的矛盾,还是“现代科学文化所要求的高度责任感与小生产者的愚昧、冷漠、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小说中“思想改造”

到底是谁应该被改造的问题^⑥……举凡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冤假错案,大部分都被严老师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地做出了平反昭雪,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此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良好开始。这些学术纠错今天看起来只是正常,当年却是充满政治敏感性的棘手事务,严老师依据历史事实,以大无畏的气概,一马当先,披荆斩棘地跨越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沟沟坎坎,为我们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处于古今中西之交、追求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自主创造力的多样复杂的万千风采,而非二元对立的中国革命斗争演绎。还有一个例子,应该是1982年11月吧,徐迟在《文艺报》发文讨论《现代化与现代派》,得到文坛李陀等人的热烈响应。严老师当然不会像李准那些人一样反对现代派文学,但对讨论中把文学现代化和提倡现代派文学简单画等号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现代文学大于现代派文学,不仅现代主义文学是适应现代化的产物,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同样也都是;而且中国的现代派文学并非如李陀所说始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出现如新感觉派那样地道的现代派文学,比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早出现了半个世纪。听闻严老师发在《文艺报》的《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令李陀很不爽,但事实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所谓“论断必须依据历史事实做出,否则即使观点再新颖深刻,面貌再漂亮吸引人,也只是卖弄皮相,不足取”的意思。

就美学原则而言,其对文学史评价的重要性不用多说: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因为文学不是在真空中发生,所以必须关注其产生的时空条件,关注其历史性和社会性。文学批评的美学原则实际涉及对文学作品的一切主观创造——诸如故事、人物、思想、情感、心理、精神、格调、风格等内容和形式多方面的评判。美学标准是文学史准入的第一门槛,史家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感受性如何,是人云亦云,还是能够独特发现,发人所未道,决定着作者“史笔”的质量。严老师著作中显现其“诗识”“史识”者常见乐为人称引,如“中国现代小说从鲁迅那里开始,也在鲁迅手中成熟”,中国现代文学是“与世界各国取得

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文学^⑦，金庸小说代表着“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⑧……这些断语背后，体现的却是严老师对美学原则的坚持，是他宏观的视野、“作品拜物教”一样的作品精读功夫以及准确的感受力和深刻的理解力。

严老师体现于文学研究的美感原则，首先是准确。我们读他的文章，常有“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之感，概括准确到位，表达贴切传神。就其用力最勤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而言，严老师对鲁迅、郁达夫、茅盾、吴组缃、沈从文、丁玲、张爱玲、丘东平、路翎等作家的小说，无不“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把握其思想和艺术精神鞭辟入里。他对“社会剖析派”作家以社会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创作小说的特征的揭示，对“新感觉派”表达都市生活对人的官能和心理冲击的表现艺术的概括，对“京派”之写文化、写美学、写自然和人关系的强调，对“七月派”小说心理现实主义的定性，无不“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对现代小说不同流派的艺术风貌和创作机理恰如其分地予以科学说明。其对作品特质的把握，虽是主观的感受，却是数学一般的精确，是大家手笔。其次是坚持，忠于自己的艺术感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奉行美学批评的“直道”。严老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出版前后，另一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巨著也同时面世，就是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该著以其包罗万象的文学史广度和对作家作品各尽其美的宽厚取胜，同样受到学界肯定，令人惊艳不已。有时人们闲谈二者异同，说严著胜在宽严得宜，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杨著则胜在隐恶扬善、各美其美的“宽仁”。就“史笔”而言，“溢美”的“宽仁”当然不如美美恶恶的“方正”，历史终究还是要褒贬衡量的。我想以严老师对“七月派”小说“痉挛性”问题的讨论为例。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正式出版前，严老师1982年就在北大开讲“中国小说流派史”课，随后1984、1985年吧，在《小说界》《小说林》《北京大学学报》《文艺报》连续发表过部分章节或梗概、鸟瞰之类的文章，引发热烈讨论。对“七月派”小说家，严老师指出其思想气质存在某种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痉挛性”，有点神经质。对丘东平烈士的牺牲，严老师比较赞成他死于日寇“扫荡”之际因带领鲁艺华

中分校学员撤退造成伤亡的自责，是死于“不全则无”的道德完美主义的自杀，有某种尼采气质。但一些七月派同人（如罗飞、何满子）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说丘东平之死属于事实问题，还比较容易澄清的话，那丘东平、路翎小说的“痉挛性”则属牵连着美学评价的阅读感受，容易言人人殊。但是只要不带偏见，在丘东平《多嘴的赛娥》《通讯员》尤其是路翎的大量作品中，那种心理的反复动荡和情绪的痉挛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仅仅因为丘东平是革命烈士，路翎是进步的左翼作家，就否认其作品中精神痉挛或某种歇斯底里心理的存在，不仅难以对这些作品做出真实的美感评价，而且会沦为强调身份政治正确的“大批判”逻辑的一丘之貉。实际上，七月派小说的这种“痉挛性”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和重要的美学表现的意义，不仅与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投身革命的激情性和狂热性有关，也与其投身革命的自我适应或不适应有关，更与小说家理解和把握这种“体验到的历史和心理内容”的独特方式有关——其心理化和激情化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自我扩张恰与延安文艺之去“小我”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抑制形成对比，体现了中国左翼文学内部的张力，反映着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这种“痉挛性”，严老师虽然觉得有点“不很健康”——七月派同人正是因此与他激辩——但若不能立足于这种“痉挛性”的真实存在，论辩再激烈其实也辩不出什么道理来。立足于七月派小说对这种精神痉挛性和歇斯底里心理的表达，本来可以撬开其通向中国特色的“左翼现代主义”之路障的，可惜七月派同人自己却不愿承认，宁要钻进现实主义的牛角尖中一条道走到尽。

对美学原则和历史原则的选择和侧重，严老师提供的答案依然是兼取、并重和结合。只要是在“多”与“一”之间的选择，严老师一般都会选择“多”而非“一”。其中也许寄托着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偏袒，为了避免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简单化、政治化和抽象化，严老师后来更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正反分布理念与之抗衡^⑨，反对“跨元批评”“异元批评”^⑩这种“批评暴政”的泛滥和蔓延。

三、学术体制：“立”还是“破”？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建构者，严老师治学之既“立”也“破”的求真、求实、求新，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体制，本来建基于诸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导言、周作人和朱自清等人的新文学史讲义这些新文学家“夫子自道”的自我肯定之上，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学术体制，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这种与中国革命相伴相生、甚至直接就作为中国文化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科，自然承担了为中国革命、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论证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使命，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如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叶丁易、刘绶松、张毕来的著作，无不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相关论述为指导原则。这些著作属于个人著史，难免存在由于作者方法、趣味、偏好、水平、学统等差异所导致的体现国家意志之“不及”与“过”的问题，但毋庸讳言，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原则，是确实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导言那种新文学的自我肯定的。也正由于个人著史的局限性，才有1962年唐弢先生主编高校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事的提出，而严老师，就成为这一官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骨干，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家体制”的建构。后来这套教材虽由于“文革”而被迫中断，但到改革开放时期重新编写，严老师却承担起更重要的写作使命并且担任该书第三册的主编。这套教材在新时期做出许多调整，不过仍然沿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结构，仍然重在呈现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革命的“共感同构”。因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体制的确立而言，晚辈后学的严老师其实是比后来受批判靠边站的王瑶先生等前辈学者更处于学术体制主流的。这种由体制赋予的权威感，不仅极容易使人陷于庙堂话语而乐在其中，同时也极容易陷于学术实用主义而伤害历史真实的。

但严老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揭示中国现代文

学产生、发展的全部事实真相，不断追求真理，不断拓展中国文学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和多元艺术趣味，是他从事文学研究的基本动力。官定教科书的条条框框并不能束缚严老师的手脚，更无法左右他的思想。虽然一方面严老师也从事这一官定体制的维护，如1983年底和樊骏、杨义等一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权问题的发声^⑩；但另一方面，严老师自己却早已开始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流僵硬学术话语的瓦解，这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存在“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从承担意识形态使命转移到探讨文学现代化问题的“纯学术”上来。就学术体制的“立”与“破”而言，严老师其实是一身二任，通过贴近时代和历史真实的自我革命，逐渐落实着其忠于历史、忠于文学、忠于自我的学术进程。其中作为，既体现他的“经”，也包含他的“权”。

依傍国家学术体制的“立”，要真正立得住，其实也不容易，并非简单地忠于国家意志就可以，还必须足够学术——只有建立在充分学术含量和专业水准之上的学术建构，才能对国家与革命之正当性做出好的表达。严老师曾总结文学史撰写的经验教训说：“无数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性是一切研究获得成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检验党性、人民性的标尺。”^⑪即以严老师参与主编的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若没有唐弢先生对“入史”标准的从严把控（如只有新文学家才入史，其他如现代通俗文学、现代旧体诗词等均被排斥在外），以及相关史实必须查对原始出处等硬性撰述要求，没有严老师等学者严谨、扎实的对历史事实的坚持，其主流学术体制的权威也难以确立。严老师新时期以来的“拨乱反正”以及以“文学现代化”为中心的新的文学史体制的建构，既是对自己参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旧体制的扬弃和摆脱，也是对一种由学术意志主宰的新体制的召唤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意志逐渐让位于学科自身的自主和自律——其求真求实、既“破”且“立”、以探索和揭示历史真相为宗旨、不断自我超越的学术形象逐渐建立了起来。

在论文、专著和文学史通史的写作中，严老师似

乎特别看重文学通史和教材的编撰。说实话,我对严老师的这一侧重并不能完全理解。在我个人的阅读爱好中,论文的价值排第一,专著排第二,通史类著作和教材排最后。像李泽厚曾深刻地影响了我对中国的理解,就是靠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论文集,他那些大部头通史如《美的历程》反而所得有限,还不如几篇论文。严老师对我的影响也是,《求实集》和《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居首,但其《流派史》却是当系列论文看的。通史类著作和教材的存在确有其必要性,但若说它居于学术著作的顶端,恐怕没几人会同意。

但这类著作却带着其他著作无法赋予的学术体制感,即使是个人化的著史,也俨然具备凝聚学界共识、集成学术成果和排定学术座次之效用。有人说北大中文系在学界的江湖地位,若没有游国恩、季镇淮、费振刚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等一批教材,恐怕学术基础就没那么坚实,影响也不会那样庞大。倘若第二代学者中没有袁行需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钱理群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辈学者打下的江山基业也不会得到很好继承并有新的拓展。应该说,严老师对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体制的努力是有明确追求的,但有意思的是,他对打破学术体制的努力同样也是有明确追求,而且更加使劲儿,更内在于他的学术生命和学术使命。

因此必须说到他20世纪90年代展开的金庸小说研究和近十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强烈关注。正是在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他对既有学术体制的强大爆破力,以及在学术研究中求新求变、不断开拓进取的阳刚之气。金庸小说自出世就广受读者喜爱,所谓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我自己也觉得它比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些中文小说更好。但在20世纪90年代,金庸小说是无法进入文学研究正规体制的。一些人把武侠小说当“鸦片”^③。开明一点的,允许当成游戏笔墨戏说,不过做博士论文就不行,申报研究课题更是休想。但严老师却石破天惊

地在北京大学开讲金庸,把金庸小说高度评价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严老师一本正经的“体制化”讲法和体制里对金庸小说“非主流”甚至“不入流”的成见相激,一时间竟令一些保守人士陡生荒诞感,私下议论纷纷。其实在严老师的金庸研究里,他所重视的金庸小说与新文学的联系,还有弘扬侠义精神什么的,虽然重要,却未必是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之所在——金庸小说对于新文学的意义,甚至有可能与严老师的判断正好相反:它或许恰恰是因为“反新文学”,因为把新文学所抛弃的旧小说写法捡起来,推陈出新,才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其成功不是因为学习了新文学,反而因为延续了旧小说。不过严老师以研究托尔斯泰的态度和方法研究金庸小说,就等于把现代文学研究体制的严肃性和正统性赋予了新武侠小说研究。因此若论金庸小说的“抬举”之功,论把金庸小说研究学术体制化,严老师当居首功,可以媲美王国维之研究宋元戏曲的。从这个事例可以见出严老师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体制既“破”且“立”、亦“立”亦“破”的学术意志的坚定贯彻。此外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也许是近十年来严老师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关注。据严老师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他就发现黄遵宪的一些主张比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观点表达更明白有力。依据观点服从史料的原则,当时他就主张现代文学的起点可以从清末算起,但是被林默涵反掉了。^④在他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时,严老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依据理论主张、包含通俗文学的创作成就、汉译和外语写作的“国际交流”等几方面的考察,有了更加出人意料和挑战学界成说的观点,不仅时间大幅前移,根据也是跳跃腾挪,视野极其宏大。其中最引发争论的,是把清末驻法外交官陈季同用法语创作、1890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在2010年才有中文译本的小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根据之一。记得2012年北大现代文学教研室内部曾讨论严老师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新观点,大家都感到一头雾水,竟无一人附和严老师。我自己提出的质疑是,近代文学中的现代性要素,是否还是持“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说更为稳妥,否则新

文化运动和鲁迅的意义就会降低和减弱;《黄衫客传奇》以法语写作,它与现代文学所追求的民族国家目标岂不矛盾,毕竟中国现代文学是“国语的文学”;尤其是王风说《黄衫客传奇》的译者李华川就是他读博时期的同屋,他21世纪的翻译怎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记不清严老师当时是怎么回应的了,总之教研室其他老师们并没被严老师说服,也就是说,种植在其他老师脑中根深蒂固的现代文学研究体制依然牢不可破,并没被严老师轻易打破。年轻的八〇后学者张丽华,更从超越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的角度理解严老师把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写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⑤。事实证明,严老师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新思考,不仅拓展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视野,而且确实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质。在其一“破”一“立”的探索中,不是我们自己对了,而是严老师对了。对于破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体制化成见,严老师并不因为自己是学术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建构者就保守,就故步自封,他是单人独骑,离开人群集聚的城乡,不断策马跃进到四顾无人的学术极地和历史荒原,当“破”则“破”,当“立”则“立”,踏出并延展着一条求真、求实、求新、不断进取的学术之路。

有时候我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老师学术实践和学术风格就像儒家的孟子和荀子,更像是书法领域的颜真卿:他晚年的金庸小说研究和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新奇论述,其超乎凡庸的“胆大妄为”、天马行空乃至大无畏气概,很像颜真卿的《裴将军诗》,已经进入学术研究之精神意志、科学求真、艺术表达三剑合一的新境界。

结语

严老师20世纪90年代初借住在双榆树小区时,我曾冒昧地问过他一个问题:听说中文系同行有一种说法:就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论人力可至的成绩,您已达到极致了。但如果治中国历史或古代文学,您的学术成就也许更大,学术地位可能更高?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毕竟只是二级学科,容量和重要性有限。您后不后悔呢?记得严老师愣了一下,并未回答我提的这个有点世俗功利的问题。也许他并

不以为然。在《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⑥一文,他曾回顾自己对文学一生的深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吧。在治学生涯中,严老师始终奉献、一直坚持、孜孜以求的,不过唯实、求真、致善、尽美而已。而其人之所立,学之所究,生命之发扬而充实者,岂有他哉!

2021年12月22日于磨砖居

注释:

①分别见《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②分别见《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1964年第4期。

③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④可参见严家炎:《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⑤参见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⑥参见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⑦参见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⑧参见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鏞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词》,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⑨参见《有关文化生态平衡的思考》,《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4日。

⑩参见《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20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3期。

⑪严家炎:《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期。这篇论文似《严家炎全集》失收了。樊骏:《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杨义:《应该如何认识“五四”文学革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期。

⑫《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南京大学《文学研究》第四辑,1993年。

⑬见鄢烈山:《拒绝金庸》,《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

⑭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若干问题答客问》,《严家炎全集·对话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

⑮参见张丽华:《从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入史反思文学史的民族国家框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⑯见严家炎:《严家炎全集·问学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